

通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明史（三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冯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

明神宗死后，太监冯保与大学士张居正合谋，端掉了首辅高拱。张居正如愿当上了首辅，但仍不甘心，还想进一步致高拱于死地。

神宗万历元年正月的一个早朝时，十岁的小皇帝刚走出乾清宫，随从们就看见有个无须男子，穿着宦官的服饰，腰挂佩刀，急急忙忙向前赶来。宫中卫士立即将他拿下，司礼监冯保马上对这人进行了审问。那人说名叫王大臣，在总兵戚继光处当兵，由于不如意，才逃跑出来，在京城流浪。

冯保将此事密报了张居正，张居正说：“戚将军掌握南北重兵，千万不要无端攀扯他，倒可以借此清除高某。”冯保就派他的家人辛儒去对王大臣进行威胁利诱。给他好吃好穿，又给金钱，让他招认说，是由于高拱心怀不满，才支使他前来行刺皇帝，而且还指定一个家人同他联系，共同谋划。冯保和张居正又分别将王大臣的伪供上奏皇帝，皇帝就命冯保负责严讯。

冯保和张居正的图谋，朝中大小官吏心里都明白，也引起了不少反对。朝中两位大臣，吏部尚书杨博和都御史葛守礼，一同去劝说张居正。张居正冷冷地说：“东厂已经审问清楚了，只等捉到同谋人后，就上疏请旨定案。”葛守礼说：“我葛守礼不



是曲附乱臣贼党的人，我敢以全家百口担保高公并无逆谋。”杨博也说：“高公尽管粗暴一些，但怎么会干出这种事？我们是想请相公主持公道，那些东厂宦官哪里是有良心的人？倘若株连开来，事情就不好收拾了。”张居正不承认自己想陷害高拱。葛、杨二人又反复讲了嘉靖年间夏言、严嵩、徐阶、高拱递相倾轧，彼此都大损名望的历史教训，望张居正引以为鉴。张居正愤愤地说：“二公以为我是有意与高公过不去吗？”说罢就起身入内，拿出东厂的揭帖扔给杨博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谁知那份揭帖上正好有他亲笔修改的“历历有据”四字，可被他偶尔忘掉了。杨、葛都认识张居正的字体，他们彼此相对一笑，将揭帖装进袖中。张居正这才发觉露了馅，他表情尴尬地解嘲说：“他们不懂法理，我顺便改了几个字。”葛守礼严肃地说：“如此严重的机密大事，东厂不马上报告皇上，却先通知内阁，这不妥吧？我们两人并不是说相公故意与高公为难，我们以为事到如今，非您无人有回天之力。”张居正也觉得事情弄得有些过分了，便说：“倘若有我效力之处，岂敢不出力？只是事已至此，怎样善后？”杨博说：“就怕相公不肯出力，您只要愿出力，善后又有何难？可以请出一位有力的勋贵大臣出面审理就行了。”张居正只得答应审慎收拾事态。

因为张居正方面有了松动，皇帝这才下诏命冯保与左都



御史葛守礼、锦衣卫都督朱希孝共同审理此案。朱希孝听说让他去审理这桩要命的大案，吓得与他的哥哥、成国公朱希忠相对大哭，他骂道：“是谁那么缺德，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，让我去干灭门大祸的事！”哥俩马上去找张居正诉说苦衷。张居正冷笑着说：“你们去找杨大冢宰和葛大中丞吧。”朱希孝又哭着去见杨博，杨博安慰他说：“朝廷是想借重您的勋戚威望，以保全朝廷的尊严和宰相的体面，哪里会忍心陷害您的身家！其实审问这案子也并非难事，您只要先派一个能说会道的校尉，去监牢里同王大臣好好谈谈，摸清他的底细，谁指使他那么说的，刀从何来。再把被称为他的同谋的高家仆人杂入一群人中，让他去指认，与高家有无牵连不就清楚了吗？然后再问他在哪里见到高公？高公什么样子？高公有没有指使他，不就明白了吗？”朱希孝破涕为笑，点头称是，回去照办了。

朱希孝派去秘密询问王大臣的校尉，果然弄清了王大臣的口供是冯保的教诲。校尉告诉他：“进宫行刺是全家该斩的勾当，这样的事，你怎敢答应？如今你原原本本说出实情，或许还可以免罪。”王大臣哭道：“他们哄我说，主使者才是死罪，我只要自首就没有事，而且还有官有赏。我哪里知道有那么厉害？”高家仆人押到后，混入诸校尉中，王大臣哪里认识！

到会审时，冯保问王大臣：“谁主使你进宫行刺？”王大臣

睁大眼睛，仰头答道。“是你叫我干的，还问我？”冯保一下子泄了气，勉强再问道：“你先说是高相国，为何又变了？”王大臣说：“这是你教我说的，我一个下贱小人，怎能认识高相国？”朱希孝问他的蟒袴刀剑从何而来，他说：“是冯家仆人辛儒给我的。”朱希孝怒斥他说：“你想诬枉审问官吗？”

冯保看见他的谋划全部败露，审问不下去了，只得派人暗中给王大臣喝了生漆酒，将他害成了哑巴，让他说不成话。然后再将他移送刑部拟罪，将他斩了完事。就这样，一场统治集团的权力之争，以杀掉一个可怜的小工具而告结束。高拱总算是逃脱了这场陷害，但他从此也只得闭门独居，官僚们来往河南，都不敢经过新郑，怕被猜忌惹祸。冯保、张居正尽管未能如愿，但他们的权势更为煊赫，即使有人不满，也不敢多说。

《明史·冯保传》

严本悉心复审案件

严本，字志道，明朝初年一个留心刑律之学的文士，早年就曾为宋朝人傅霖所著的法学名著《刑统赋》作过“辑义”四卷。明成祖永乐年间，被推荐为官，任刑部主事，仁宗初年，改任大理寺正，一生都在中央司法部门任职。



大理寺是明代中央“三法司”之一，执掌复审、驳正刑部、都察院以及各地所审理的人命重案之事，有情词不明或失出、失入者，驳回改正。所以，大理寺的官员务必熟悉律条律例，善于辨析疑狱，鉴别量刑轻重。严本立身严正，临事能谨慎深思，经他复查的案件，平反冤抑不少，深为法司大吏所倚重。

有个青年陈生，是御史陈旭的儿子。一天，他和一个同乡在饭馆吃饭，忽然来了一群逻卒，将两人捉到官里。原来他的这个老乡是在逃的抢劫杀人犯，同党七人已被诛杀，只有他被通缉多年，未曾捕获。更可恶的是，这个强盗被捉后，不但不为陈生洗刷，反而诬指为同伙，并说陈生也分了赃。案子未结，那强盗死于狱中，因此，陈生的冤枉更无从说清。这个官家子弟受皮肉之苦，只得诬服，甚至还把他母亲的簪珥等物说成是他分的赃。

严本阅读案卷，发现前七人的招供中根本没有陈生的影子。他又把失主叫来看验陈生交出的赃物，失主也否认是他的。严本更加怀疑，就提问陈生，陈生痛哭称冤，泣不成声。他决心为陈生平反，但同官们都说这案定了很久了，改正起来极难。严本说：“既然弄清是冤案，又不为蒙冤人平反，执法者能不惭愧吗？”他毅然单独签署平反意见，最终得到允准。

京师附近的良乡县，有个乡民丢了一匹马，他怀疑是被邻



居某偷走，可又无确凿证据，便将此事告到县里。审案的县丞不加详察，就将被怀疑的邻居抓来逼供，乃至拷打毙命。死者家属上告，主审官员判定是丞用刑不合法律，当处徒刑；而告状的失主，却被判了绞刑。案件报到中央法司审批，严本阅罢案牍，发现有非常大的失误，他说：“县丞判了徒刑，倒也适当。但告状人只是由于有所怀疑而上诉，只求官府查出真贼，而原判竟以诬告致死的法律定他的罪，怎能算是公道？倘若这个罪名成立，岂不是等于说县丞非法拷死一人，原告又诬陷致死一人，能够这样说吗？”经他指出此案致错的症结，终于得到纠正，救了原告一命。

再一桩是山东送来的案件。莒县屯卒抢夺农民的田地，农民告到官里，官府判屯卒无理，略施笞刑惩戒。屯卒怀恨在心，时刻寻思报复。一天夜里，盗走了那农民的驴。农民猜想是屯卒所为，前往屯卒住处一看，果然自己的驴拴在那里。因此，双方又争执起来。屯卒蛮不讲理，反咬一口，硬说农民无端诬陷他，煽动同伙将农民捆到他们的管理机关千户所。明初重武，武官经常骄横不法，无视地方行政职权。这个千户所的千户就是个无法无天的武夫，他不管青红皂白，就将农民强行关押起来，百般折磨至死。出了人命，地方官才过问此案，最后仅将千户判处徒刑上报。严本复核时，明确地指出：“千



户要是还可以保全一命的话,那农民头上的‘诬陷’罪就冤沉海底了!”意思是说,千户不仅犯了非法关押平民致死罪,更犯有诬陷无辜、屈杀好人的大罪。在严本的指驳下,使草菅人命的军官得到了应得的惩罚。

还有一件也是悍卒犯罪的案件。苏州卫的兵卒十余人,因事乘船北上,船泊运河北端的重镇河西务。某晚,这伙兵卒恶性发作,乘夜出去抢劫一条客船,没想到那条船上的水手和客商防卫有力,贼兵不仅没有捞到好处,反而有个兵卒被打成重伤而死。这伙人怕事情暴露,就编造谎言说,停靠在他们船只旁边有一条押解凶犯的船,船上的解差夜出抢人,而他们是见义勇为,前去抱打不平,不料却被解差打死一个伙伴。审案人偏听谎言,拷打解差,严刑逼供之下,解差屈服。严本发现此案疑点甚多,说解差杀人,证据也不充分。他说:“解差与囚犯同船,解差是否出去抢劫,囚犯理应知道,怎么没有囚犯证词?”因此,驳回再议,果然查出实情,惩办了卫卒,开释了无端受害的解差。

严本复核案件,就是这样凭着他的学识才力,悉心体察,必求公平合理,避免了不少错案、冤案的发生。

李自成严惩前朝昏官

李自成起义军打进北京后，严厉惩处了一批明朝政权的上层昏官。崇祯末年的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，是其中两个突出的代表。

陈演庸才寡学，可善于钻营结纳。当大学士后，对于日益严重形势，他无所筹划，只知争权纳贿。直到北京陷落前一个月，才被迫下台。临到返回原籍之前，他到崇祯那里去辞行。他恬不知耻地说着一套“臣佐政无状，罪该万死”之类的废话。面对这个贪庸误国的前宰相，崇祯眼里气得冒火，怒斥道：“你死有余辜，快给我滚！”

可当时京城内外兵荒马乱，行路极不安全，陈演搜刮的资财丰厚，唯恐路上被抢。如此一犹豫迁延，就到了农民起义军合围北京之日，再要“滚”也滚不出北京了。

李闯王进京后，陈演不仅不为大明朝尽忠殉节，反而无耻地想投机当新朝的开国元勋，便和成国公朱纯臣一起带头“劝进”。当然，李自成要不要当皇帝，有他的既定方针，他是不会理睬明朝无耻大臣的献媚的。

不久，大顺政权开始对旧官僚“追赃”。陈演被迫献纳银三万两、金三千两、珠三斗，仍然未被饶过。牛金星的士卒将



他用铁索穿手，拖着游街，行动稍迟，便皮鞭乱下，打得鲜血淋漓，狼狈不堪。后来李闯王不得不亲自领兵东征吴三桂，为了防止残存的明朝勋贵、大臣乘机兴风作浪，便果断地将包括陈演在内的一批旧官僚处死，以绝后患。

魏藻德崇祯十三年的状元，仅过三年就擢升为大学士，这在明朝历史上，是非常罕见的升官速度。

李自成打进北京后，魏藻德被扣押在将军刘宗敏府第的一间小屋里。这个末世昏官不甘就此沉沦，还想在新朝投机出仕。他从窗户缝隙间招呼看守士兵说：“烦劳转告刘将军，若能用我，不拘大小都行，快放我出来吧！”

新成立的大顺政权如何容得下这般一个无耻的旧官僚，很快也对他进行了严厉的“追赃”拷打。刘宗敏亲自夹讯了他，责问道：“你位居首辅，把国家弄得这样乌烟瘴气，你有罪没有罪？”魏藻德巧言狡辩说：“将军知道我是一介书生，本来不熟悉政事，再加之先帝无道，国家大政才弄得这样不可收拾。”

魏藻德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刘宗敏早已气得重重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厉声怒骂道：“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以书生起家，一举点了状元，不到三年又当了宰相，位极人臣，崇祯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？你有何脸面配说他无道！”立即又叫左

右几个健卒再掌他数十个嘴巴，接着又连续进行追赃拷打几昼夜，终于将这个无耻大官僚夹死在两根刑棍之间。

(《明史·陈演、魏藻德传》)

军 事

李自成称王

明朝末年，政治腐败，民不聊生。各地百姓纷纷起义，共十三家、七十二营。至明崇祯十六年(1643)，起义军首领们或降或死，仅剩下李自成与张献忠两部势力最为强大，而李自成的势力更大。

李自成与张献忠同年(生于1606年)，陕西米脂人。史载他“善骑射，斗狠无赖，数犯法”，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乱世枭雄。崇祯二年(1629)参加号称“闯王”的高迎祥的反明起义军，渐受高迎祥信任。崇祯八年(1635)，十三家、七十二营起义军首领在河南荥阳集会，商议突破明军包围的方略，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，四路攻战的建议，得到一致赞同，赢得极高的声望。



次年，高迎祥被明军擒杀，李自成继为“闯王”。

崇祯十六年，李自成率军在汝州（今河南临汝）击败明兵部尚书、陕西总督孙传庭的大军，孙传庭率残部四万人退守潼关。

明将高杰欲弃潼关，退入西安，凭城固守。孙传庭认为潼关险隘乃西安的门户，潼关若是失守，陕西必然大震，军心必将涣散，更加难以挽回败局，于是决心据险扼守，以部将白广恩残部守潼关，以巡抚冯师孔的川、甘兵守商、洛，以策应西安。

李自成对于潼关、西安，是志在必取。是年十月，李自成率大军进逼潼关。他知潼关素称“天险”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历来攻取潼关者，多用奇袭战术，方能奏效。因此，李自成派其弟李成率一部从潼关正面佯攻，而自率大军潜入关南山中，缘山崖迂回穿插至潼关后背，与李成所部前后夹击，明军大败。孙传庭见情势危急，跃马挥刀，冲入李自成军中，奋战至死。明将乔迁高、张尔猷、盛昶之、李继祖、袁化龙、许嗣复等皆战死，潼关遂被李自成攻克。

李自成既取潼关，乃长驱直入，进攻西安。陕西巡抚冯师孔率兵前来阻击，兵败被杀，西安亦落入李自成之手。

李自成顺利占领西安后，纵兵大掠三天，然后才下令禁



止，改西安府为长安，称作西京。

翌年，李自成在西安称新顺王，国号大顺，改元永昌。

（《明史·李自成传》

《明史·孙传庭传》）

平海卫之战

明嘉靖四十一年，由日本国亡命政客、失意武士、流氓无赖、无业游民组成的海盗组织——倭寇大举进犯福建，围攻兴化府城，明将刘显率军赴援，预先派人与城中联络，不料其联络人员在途中被倭寇杀死。倭寇竟穿上明兵之衣，谎称刘显之使者，入城欺骗明军守将放松戒备，倭寇大军遂乘夜入城。

倭寇攻克兴化，朝野为之震动。明廷急任参政谭纶为福建巡抚，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，戚继光为副总兵官，前往福建平倭。

第二年（1563）二月，倭寇闻知明军南下，乃弃兴化城，进攻峙头。明军都指挥欧阳深误中倭寇埋伏，与所部数百人皆战死，倭寇于是乘胜攻克平海卫。

四月，谭纶、俞大猷、戚继光率部先后赶到福建平海卫。倭寇自知不敌，想从海道逃跑，谭纶乃令士兵设栅栏截断倭寇



入海之路，又令明将许朝光在倭寇入海路口截击，倭寇见退路已断，只得又退回平海卫城，烧掉舟船，不敢再出。

谭纶分兵三路，以戚继光所部为中路，以刘显所部为左路，以俞大猷所部为右路，分进合击，水陆夹攻，志在全歼倭寇于平海卫。

戚继光进军前，先在军中找了一个平海卫籍的士兵为向导，从间道出敌不意，登上了城北的高地，并马上发起进攻。倭寇未想到明军会从背后突然出现，军心惶惑，明军乘势登城。

这时，俞大猷也率部从海上进攻平海卫的南门，配合戚继光夹击城中的倭寇；都督刘显亦率军队猛攻崎头的倭寇，使倭寇各不相顾，明军遂一举收复平海卫。

盘踞于崎头的倭寇听说平海卫已被攻克，大恐，无心恋战，遂被刘显击溃。

平海卫之战是明军平定福建倭寇的一次决定性战役，共杀死倭寇二千二百人，夺回被掠夺的福建居民三千人。

戚继光部因首先登上平海卫城，功最高，受上赏，升为都督同知，代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，世荫千户；俞大猷调为广东总兵，赐以银币，以旌其功。

戚继光与俞大猷均为抗倭名将，史载“大猷老将务持重，



继光则飙发电举，屡摧大寇，名更出大猷上。”一年后，即嘉靖四十三年，戚继光又败倭寇于仙游，追至王仓坪，复大败之。倭寇残余掠渔船出海逃走，福建倭寇乃告平定。

(《明史·戚继光传》、

《明史·日本传》)

抗日援朝

大和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崇尚武力、侵略、扩张，野心勃勃的民族。明成化三年至明嘉靖四十年(1467—1566)间，为日本历史上的“战国时代”，其国虽尚未统一，而其国内的失意政客、亡命武士、无业游民等等，便组织起来向海外冒险，屡屡蹂躏明朝东部沿海，这是日本非政府侵略行为。

日本将军织田信长尚未统一日本，即有“假道朝鲜西征中国”的国策出台。至明万历十八年(1590)，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全国，便迫不及待地要发兵入侵中国，并向朝鲜国王提出借道要求。

朝鲜乃明之属国，当然不会答应丰臣秀吉的这种无理要求。丰臣秀吉遂于明万历二十年(日本天正十九年，1592)遣军侵入朝鲜。朝鲜国弱难敌，乃向明朝求援，明朝于是发兵，



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抗日援朝战争。

至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,中朝联军经过浴血奋战,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,丰臣秀吉不仅不能实现其合中、朝、日三国为一的野心,连朝鲜亦无法征服。是年八月,丰臣秀吉病重,死前悔恨不该与明朝交兵,遗命从朝鲜撤兵,道是“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”。

十月,日本军队遵照丰臣秀吉的遗命,决定各部依次乘船回国。

明将陈璘闻讯,马上联合朝鲜海军大将李舜臣,统率战船三百艘,封锁光阳湾、露梁海峡,密切监视泗川、南海岛、固城一带的日军的动向。

日本顺天第二军由小西行长率领,乘船率先来到光阳湾口的猫岛附近,遭到预先在此设好埋伏的中朝联合舰队的狙击,小西行长所部苦战数日,终难突破中朝海军的封锁线,于是连忙向屯于泗川、南海岛的日军求援。

日本泗川第五军将领乌津义弘得讯,于是连夜率舰队驶向露梁海峡,欲入光阳湾,营救被围困的小西行长所部。

驻扎南海岛的日将宗智义也率部赴援,途中与乌津义弘会合,乃集战船五百余艘、海军一万余人,连夜通过露梁海峡,向光阳湾驶来。

陈璘、李舜臣闻讯，也调兵遣将，计划与日军展开会战。

其部署为：明军副将邓子龙率巨舰三艘为前锋，待日军舰队驶过露梁海峡后，击敌后背，阻断敌之退路；李舜臣率朝鲜海军埋伏于南海之观音浦；陈璘率明水师埋伏于竹岛与水门洞之间的港湾内。部署既定，只待日军到达，然后三面夹击之。

十一月十九日凌晨二时，“月挂西山，山影倒海。”日军舰队已大部通过露梁海峡，邓子龙即率巨舰三艘抄至日军后背，李舜臣也率舰队乘夜潜至，逼近日军舰队。这时，邓子龙令前锋巨舰开炮，呐喊着直赴日军舰队，李舜臣也麾众前进，冲向敌舰。

邓子龙是时年逾七十，“意气弥迈”，“携壮士三百人，跃入朝鲜舟，直前奋击，贼死伤无算。”激战间，联军中有人误投火器入于邓子龙所乘舟中，舟马上起火，日军趁机来攻，邓子龙竟英勇殉国。

李舜臣亦在激战中阵亡。中朝两军的主将皆战死殉国，亦可见当时海战的激烈程度。

陈璘也率部投入了战斗，中朝两军并肩作战，左右夹击，日军的战舰多被焚毁或击沉，士兵死伤过半。乌津义弘见大势已去，匆忙率五十余只战船逃离战场，日将桦山久高率数人登陆逃脱，余下日军全部被歼，死者数以万计。